

冷战格局下的美国与伊朗特殊关系(1945-1978)

何奇松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200237;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江西 井冈山 343600)

摘要:在冷战格局下,从二战结束到伊朗发生革命,美国和伊朗逐渐形成了“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是依靠双方的武器和石油交易来维系和加强的。美国希望利用这层关系推动伊朗的政治、经济改革以维护伊朗的政治稳定,确保美国在波斯湾和全球的利益。但伊朗国王认为美国需要伊朗及其丰厚的石油作为遏制苏联的工具,不会向他施加太大压力,因此没有完全听命于美国。由此产生对美国、伊朗以及两国之间的关系的严重后果。

关键词:美国; 伊朗; 外交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06)01-0100-0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 and Iran in Cold War: 1945-1978

HE Qi-song

(1.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2.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Jianggangshan, Jiangxi 343000, China)

Abstract: Between the end of WW II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 in cold war, U. S. and Iran came to develop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n which American arms played ties roles and oil took on lubricators. In order to keep Iranian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Persian Gulf and the worl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hoped Iran to advanc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by this special rel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Considering that US needed Iranian oil and relied on Iran to contain the former USSR and that US couldn't put much pressure on Iran, the King of Iran didn't reply all the requests of US, which had serious effects on US, Ira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Iran; foreign relationship

二战期间,美国势力逐渐渗透到伊朗,并稳步增强,开始排挤英国、苏联势力。从1945年到1978年,美国成了伊朗巴列维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巴列维依靠美国的支持逐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美国则把伊朗的地理位置和石油看成遏制苏联的工具。由于双方相互倚重,因而形成了美伊之间的“特殊关系”,对美伊两国的交往和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今美伊之间存在僵局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这段时期的美伊“特殊关系”。

一、美伊“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收稿日期:2005-10-27

作者简介:何奇松(1972-)男,湖北仙桃人,博士,华东理工大学战争文化与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教授,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主任助理,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

早在 1856 年,美国就与伊朗(当时称波斯,1935 年改称伊朗)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一直到二战前,美国在伊朗的经济和战略利益都微不足道。二战改变了这种状况。大战中,美国的势力逐渐渗透进伊朗。为平衡苏联和英国在伊朗的势力,罗斯福总统在 1943 年德黑兰会议上要求斯大林和邱吉尔发表一项关于伊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声明。与此同时,美军纷纷进驻伊朗,到 1944 年有三万多美军驻扎在伊朗。这是美伊特殊关系的初创期。

伊朗与苏联在阿塞拜疆自治及战后苏联撤军问题上的冲突成为美伊特殊关系建立的契机。1945 年 12 月在苏联控制的伊朗北部地区阿塞拜疆宣布为自治共和国后,伊朗政府派军队前去平息事态,但被苏军挡回。伊朗只好寄希望苏军撤退之后,再平息事态,然而事与愿违。按苏、英、伊三国同盟条约,在大战结束后六个月内,外国军队应撤出伊朗。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签定投降书,这样外国军队就应在 1946 年 3 月 2 日前撤退完毕。美英在最后期限之前就撤出了伊朗,可苏联却仍无撤军的迹象。因此,伊朗于 1946 年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指责苏联公开干涉其内政,违背了三巨头在德黑兰的声明。

伊朗的行动得到美英的大力支持。由于战时合作基础的消失,美英与苏联之间意识形态的对抗再次明显化。1946 年 3 月 5 日邱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吹响了冷战的号角,当时美英报刊认为伊朗正走向铁幕背后。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当伊朗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苏联时,美国积极支持伊朗采取强硬政策,迫使苏联撤军。当苏联拒不撤军并为之辩护时,美国派军队前往波斯湾。由于苏联在大战中遭受极大损失,战后的重点是恢复国民经济,医治战争的创伤。这样斯大林同意从伊朗撤军并于 5 月完成撤军任务。

苏联从伊朗撤军对于美伊之间特殊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苏军撤离后,伊朗取消了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美国自然填补了因苏军撤离而留下的权力真空。美国强有力的反应使伊朗事实上避免了像后来的朝鲜和越南那种南北分裂的命运,保证了伊朗的统一。伊朗巴列维政权对美国表示感激,美国也以伊朗统一的维护者的身份自居。这是美伊迈向特殊关系的重要一步。

1947 年 3 月杜鲁门主义出笼,冷战正式形成。美国政府认为伊朗“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波斯湾的石油对与苏联的战争很重要”,对此,美国国务院特设了伊朗、希腊和土耳其司,表示对伊朗与中东事务的重视,给予伊朗 25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伊朗设立据点,收集苏联的情报,并针对苏联进行宣传活动。尽管杜鲁门政府强调伊朗在遏制苏联阵线上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把伊朗和中东视为战略考虑的中心,因为那时美国遏制苏联扩张的手段是“战术据点防御”,而据点防御重点在西欧和日本,美国忙于建立北约和与日本签订和约,很少考虑其他地区。^[1](P53)艾森豪威尔上台时,朝鲜战争正接近尾声,西欧已复苏,美国也牢牢控制了日本,美国调整了对外政策,加强对苏联遏制,重点支持苏联周边的亲美国国家,防止苏联在原西方的势力范围内取得立足点的全球战略。^[2](P56)为防止伊朗倒向苏联,美国政府帮助巴列维推翻了主张石油国有化的摩萨台及其政府。美国的干预使巴列维的王位失而复得,巴列维对美国感恩戴德。¹这是美伊迈向特殊关系极为重要的一步。为换取伊朗的支持以遏制苏联,美国给伊朗大量经济援助,同时培训秘密警察萨瓦克(SAVAK),以镇压国内的反对派,如伊朗 1963 年驱逐了霍梅尼。

伊朗军队进驻波斯湾则把美伊特殊关系推向高潮。1968 年,因国内经济衰退,英国宣布将于 1971 年从波斯湾撤军。这对于美国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1948 年以来美国在波斯湾保持着—个由三艘军舰组成的中东舰队,其基地是巴林。巴林于 1949 年独立后一直拒绝为美国的中东舰队提供基地。防止苏联染指波斯湾的重任就落在其盟友英国身上。而在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苏联大举向中东地区渗透,许

¹ 许多人认为这次政变的影响是巨大的,导致了美国人不愿看到的结果:“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导致了 1979 年的革命,以及目前伊美连续的僵局”:人质事件、两伊战争、苏军入侵阿富汗。后三事件“都对中东地区的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Mostafa T. Zahran, “The Coup that Changed the Middle East: Mossadeq v. The CIA in Retrospect”, *World Policy Journal*, Summer 2002, P 93, PP 98-99, also see Stephen Kinzer, “Regime Change: The Legacy”, *American Prospect*, Vol. 14, No. 10, 2003, PP40-42) 针对美国在 2003 年对伊拉克开战,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更有学者指出,现在美国在走 1953 年推翻摩萨台的老路,说不定伊拉克也会发生类似 1979 年霍梅尼的革命:“1953 年使得 1979 年的革命不可避免,1979 年是对 1953 年的报复”,告诫美国政府应当吸取 1953 年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教训。(See Bary Rubin, “Lessons from Iran”,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6, No. 3, Summer 2003, PP 105-115.)

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沦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此时美国正陷于越战,无暇他顾,因此害怕因英国撤退而形成的“真空”由苏联及其盟友伊拉克来填充,从而威胁美国在波斯湾和全球的利益。对此,美国反应沮丧。参议员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道出了美国政府当时的心态,“对英国这个政策,我表示遗憾。因为我确信我们将被要求来填充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这个真空。我不知道我们将怎么办,因为我不认为我们有人力和物力来做到这一点”。^[3](P19)

而伊朗的行动无形中为美国解了围,深化了美伊特殊关系。此时的伊朗想成为波斯湾的霸主,急于进入这个“真空”地带。巴列维深知,为防止伊朗被苏联“赤化”或沦为其附庸,即便伊朗的行动引起有苏联背景邻国的强烈反应甚至发生军事冲突,美国都会支持他的。于是,1971年伊朗放心大胆地进驻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三个岛屿。这正合美国的心意,使尼克松政府放心地实施战略收缩,确保欧洲的安全。这是美伊“特殊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环节。尼克松答应巴列维将卖给伊朗任何常规武器,尼克松不再把巴列维看成是美国在中东事务的“一个职员而是一个伙伴”,^[1](P376)并赞成他是位“世界政治家”,而且卡特总统称他是“世界资深政治家”,在中东造就了一个“稳定岛”。^[4](P91)

简言之,美国看重伊朗的地缘战略价值和石油战略资源,巴列维把美国看成是王权的靠山。巴列维要实现工业化以及要称霸波斯湾,需要一个盟国为其提供资金技术以及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苏联和英国曾经是伊朗的太上皇,出于本能的憎恶,伊朗不愿求助于它们,而美国帮助巴列维恢复了王位,又是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是当然首选目标。伊朗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业基础,逐步取代石油收入是国民经济命脉的局面,而美国需要一个稳定的石油来源为其控制西方和冷战服务;伊朗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石油运输的畅通,同时称霸波斯湾,而美国需要在战略敏感地区有一个强大的盟国,以阻止苏联染指波斯湾南下印度洋。基辛格在1976年9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和伊朗的政策一直是平行的,因而需要双边加强(关系)”^[5](P203)这样双方需要对方,两国元首多次互访,从而形成了美伊之间的“特殊关系”。1977年12月卡特总统访问伊朗时,高度评价了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

但冷战格局下的美伊特殊关系也有不和谐的杂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的摩擦也越来越大。从50年代开始,美国要求伊朗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保证伊朗的稳定。在这方面美国对伊政策很矛盾:一方面想保证伊朗的稳定,另一方面又不想过分压迫伊朗实行全面改革。肯尼迪总统上台后,美伊之间的摩擦公开化。肯尼迪政府要求巴列维全面进行社会经济改革,认为如果不进行改革,美国给伊朗再多的援助,“就像把金钱扔进了老鼠洞”。^[4](P55)约翰逊政府也在一段时期内停止了对伊朗的援助。为此,巴列维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

另外,“人权”问题成为美伊摩擦不断升级的又一导火线,最终导致了巴列维政权的倒台。巴列维为了巩固王权,实行高压统治,将全体国民分成几个等级,美其名曰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巴列维实行的政策很显然不符合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卡特政府的国务卿万斯动辄就以“人权”为话题,提醒巴列维不要忘记美国对政治迫害的态度,即使在巴列维的生存受到威胁时,也无所顾忌。对此巴列维甚为恼火,但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不得不违心地迎合美国搞起“政治自由化”,如释放政治犯等。随着巴列维与美国的摩擦加剧,霍梅尼革命取得成功,美国人“像扔一只死老鼠那样”抛弃了巴列维。^[1](P118)

二、军火贸易是美伊特殊关系的纽带

美苏两国为了谋求世界的霸权,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渗透,使这些国家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其常用手段就是通过军火贸易。军火贸易成为打击对手的外交手段。正是在这种冷战背景下,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火贸易具有了特殊意义,成为维系两国“特殊关系”的纽带。

出于谋求世界霸权和遏制苏联的目的,美国希望用军火构筑一道遏制苏联向世界扩展的“防火墙”,也就是美国所说的“前沿防御阵地”,凡是与苏联接壤的国家、地区属于前沿防御阵地。在西亚,美国把伊朗的战略位置看得特别重要:伊朗地处亚欧非三洲的陆桥之地和东西方的十字路口,最接近经苏伊士运河到印度的大英帝国“生命线”,以及苏联南疆的软腹部,是苏联染指梦寐以求的印度洋暖水港的最短

通道。控制住了伊朗,就等于美国在“北极熊”向南行走的道路上筑起了一道篱笆。

苏联也想把触角伸向全球,力图突破美国构筑的“篱笆”,首先选择中东作为突破口,并取得了相当成效。1955年9月苏联通过捷克和波兰同埃及达成的以大米和棉花换取军火的协议,把大量武器送到了埃及,突破了美国精心安排的“北层屏障”。苏联和埃及的武器交易,标志着苏联对非共产党执政的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的明显转变,而且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中东苦心经营的旨在遏制苏联的军事同盟战略的重大失败。莫斯科与华盛顿在中东地区的角逐进入了短兵相接的新阶段。此后,通过武器贸易,苏联渗透到了中东广大地区。按196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在50年代苏联卖到中东地区的重要武器为3.9亿美元,而在60年代,这个数字就增加到了15.8亿美元;几次中东战争,苏联及时向埃及、叙利亚等国提供军火,弥补战争损失。1970年到1974年,苏联卖给中东国家的主要武器为48.98亿美元,而在1975年到197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60.21亿美元。^[6](P99) 凭借其武器销售,苏联在苏伊士运河——红海——波斯湾的战略动脉上建有许多重要军事基地,如伊拉克的巴士拉。这些基地对已经拥有远洋作战能力的苏联海军扩大在各大洋的活动半径,以及加强对像红海、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地中海、阿拉伯海等战略通道和战略海域的控制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当然不会无视这些事实。美国政府急如星火般地要扩大给伊朗的武器援助,守住美国在中东的阵地,否则苏联就会取得南下印度洋的最短通道。从1950年至1965年,美国给予伊朗价值6.87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转让,另外还与伊签署了从1966年到1972年价值达1.4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转让。^[3](P15) 进入70年代后,美国增大了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力度。1968年英国宣布将从波斯湾撤军,当时美国正陷于越南战争,其盟国伊朗填充因英国撤退而形成的真空,以及1973年中东战争,美国饱受石油禁运和石油提价之苦,伊朗的战略价值日渐突出。尼克松宣布美国将卖给伊朗任何常规武器,福特政府也保证美国将卖给伊朗最先进的武器。卡特上台后,多次强调要与盟国控制武器的扩散,但美国仍需要伊朗成为波斯湾关键地区的强大、可信、友好的盟国,故对伊朗出售武器一如既往。在卡特执政的头3年,美国向伊朗出售的武器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创历史新高。在卡特政府时期,伊朗购买了4艘斯普鲁恩斯级巡洋舰,这种军舰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巡洋舰。1978年伊朗发生革命,美国对伊朗出售的武器几乎没有减少,耐人寻味的是,当霍梅尼革命取得成功时,美国的武器还源源不断地输往伊朗。据统计,从1969年到1977年美国对伊朗军售协议达119亿美元,占美国该时期军售的24.3%。^[7](P194) 出于全球战略目的和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向伊朗提供、出售武器。

另外,从伊朗方面来说,伊朗想通过美伊之间的军火贸易,谋求巩固和扩大自身在波斯湾的利益。军队是巴列维王朝支柱。巴列维深知没有武器尤其是现代化的武器,军队只不过是空架子,更谈不上帮助他实现强国梦和成为波斯湾霸主的愿望。因此,巴列维依靠丰厚的石油收入为其军队采购军事装备,而且把采购先进的武器装备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巴列维也利用美国依靠伊朗的战略地位这一现实,且以打“苏联牌”相要挟,要求美国给予伊朗军事援助,而且,还把能否从美国获得武器看成是美国对伊朗及他本人是否忠诚的试金石。^[4](P47)

1971年以前,伊朗加强军事装备的目的主要在于保证至关重要的波斯湾石油航道的畅通,由于石油是伊朗的经济命脉,伊朗为保持波斯湾的稳定而购买武器,似乎无可厚非。但在1971年后,巴列维计划宏伟蓝图——实现“伟大文明”,也就是想拥有居鲁士波斯帝国享有的国际威望,其中包括使伊朗成为世界最大的无核军事强国。伊朗明确宣布:“整个海湾地区的最强大国家,自然是伊朗,它对波斯湾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有着极大的兴趣。”其实,当英国宣布从波斯湾撤军时,巴列维国王就明确声明“美国不应该和不能踏入由英国撤离而形成的真空”。^[3](P9) 于是,伊朗的军费开支呈天文数字般的增长,1972-1975年伊朗计划购买100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还计划1975-1980年再从美国购买100亿美元的装备,其开支远远超过了1950-1970年的15亿美元的购买计划。其武器清单从先前的并不起眼到丰富多样,从1974年到1978年伊朗计划从美国订购的武器(包括交货的武器)如下:各种类型的战斗机共639架;各种类型的直升飞机共725架;各种类型的导弹共11406枚;6艘驱逐舰,3艘潜艇,414MK枚鱼

雷。通过购买美国武器,伊朗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其三军能扬威于波斯湾,1975年,以实力优势迫使伊拉克把其部分领土并入伊朗。

伊朗依靠美国武器成为波斯湾的霸主,美国通过军售不需派军队到波斯湾就保证了该地区的稳定,使伊朗成为波斯湾的“美国警察”。这样军火贸易加强了美伊之间的特殊关系。有学者指出“在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中,没有别的什么比武器出售能起到核心作用”。^[3](P19)实际上,美国向伊朗提供武器,是作为打击苏联和加强自己在中东政治地位的一张王牌来使用的,其目的是力图保证伊朗留在西方阵营,作为遏制苏联南下的桥头堡,也是为美国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服务。

三、石油是美伊特殊关系的润滑剂

美国需要伊朗的石油作为能源,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更重要的是,在两极格局下,美国把石油作为工具为其冷战服务。而石油是伊朗的经济命脉,在伊朗政治经济事务中占有传统的支配地位,为实现变革社会、称霸波斯湾的战略目标,伊朗需用石油收入进行社会改革和换取美国的武器。基于这种关系,伊朗的石油成了美伊特殊关系的润滑剂。

二战使人们认识到石油是战争机器的引擎,认识到可以把石油作为国家大战略加以利用,美国则更进一步提出了“石油就是炸弹”的口号。^[8](P145)战后伊始,美国就把石油政策当作为其冷战服务的工具。马歇尔计划就是这种政策的尝试。战后,美国担心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可能落入共产党之手,而且也担心作为欧洲主要能源的煤炭由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支配、控制。美国希望欧洲的能源结构由煤炭向石油转变,这样就能通过已经牢牢控制中东的石油把欧洲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进而遏制苏联向欧洲的扩张。因此在战后头几年美国政府和石油公司发起了一场强制欧洲依赖石油的运动,“这是战后美国石油政策的核心”。美国政府希望通过马歇尔计划为美国的石油公司拓展欧洲市场,“这种政策的根本目的却是:永远控制欧洲”。^[9](P143-144)

美国要占领欧洲石油市场,就得向欧洲出口美国石油。但美国政府考虑到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虽然出口可获取一时之利益,但有损美国长远利益,为实现美国既定政策,那就是通过控制中东的石油来达到其目的。而从1947年开始的英伊石油公司之争的石油危机为美国控制伊朗石油、进而向欧洲输送石油提供了机会。为感谢美国把英国势力赶出了伊朗,巴列维同意美英等西方公司成立国际石油财团,将20万平方公里的产油区交给财团开采45年,财团把利润的50%交给伊朗。美国五家石油公司在财团中有40%的股份,美国取代英国控制伊朗石油。而美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控制西欧和日本为其冷战政策服务的。

当有苏联背景的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时,英、法、以三国向埃及开战,埃及用沉船方式封锁了苏伊士运河,切断了中东石油运输到西欧的通道。美国政府当然知道石油对美国控制欧洲的重要性,为避免这一局势削弱北约的联盟和该组织成员国的稳定,进而危及美国的霸权,美国政府设立中东紧急委员会来满足西欧对石油的需求。从1956年11月1日到1957年3月31日,美国从伊朗购买石油,绕道好望角,每天紧急运往欧洲。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这一行动对国家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10](P150)西欧各国对美国感激涕零,为美国抵制苏联扩张效命。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美国又是利用这次大好机会,急忙从伊朗购买石油供应西方,为美国抗衡苏联捞得了不少分。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致使欧洲在1973年冬天挨冻。更让西欧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伊朗在1973年12月带头提高油价。基辛格担心石油支出的增加导致西欧各国和日本的“安全地位更加虚弱”,不利于美国抗衡苏联,因此急忙在中东搞穿梭外交,恩威并用,希望伊朗和沙特放弃禁运和降价。伊朗基本上满足了美国的要求,使得西欧和日本度过“能源危机”,美国再次获得西欧和日本的支持。

伊朗的石油对于美国控制西欧和日本,为其与苏联的冷战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当时,苏联也想在西欧遭受石油禁运和短缺之时,通过自己廉价的石油打进西欧,破坏美欧联盟,但美国凭借自己国家

的石油及伊朗和沙特的石油,挫败了苏联的企图,维护了西方的团结。^[8](P273)

伊朗为什么要把石油卖给美国,让石油为美国的冷战政策服务?当然就在于伊朗对美国别有所求,而且伊朗利用了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对峙,实现了自己的部分目标。巴列维曾经反复重申,他不会把石油当作武器,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基本上也做到了这一点。为发展经济和支持“白色革命”,尤其是为购买武器,巴列维希望增加石油的收入,要求国际石油财团提高石油产量。在此过程中,伊朗利用自身所处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关键时刻打出“苏联牌”,要求财团作出有利于伊朗的承诺,而且屡次得手。1971年伊朗与财团达成协议,财团把55%的利润交给伊朗;1971年伊朗和欧佩克的海湾国家与西方石油公司达成德黑兰协议,规定每桶石油提价46%,同时西方答应在价格方面再给予2.5%的额外补贴以抵消西方的通货膨胀。1973年,美国宣布美元贬值,回敬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西方的石油禁运,使欧佩克国家的石油收入遭受损失之时,巴列维带头把石油价格提高4倍,于是在西方引起了一场“能源危机”,迫使美国作出妥协让步。伊朗巧妙地利用美苏的冷战,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石油财团提供石油产量,增加其收入,用于社会改革和军队现代化。伊朗的石油产量从1963年的7280万吨增加到1974年的30200万吨,其中90%是国际石油财团开采的,随着石油产量和石油价格的提高,伊朗的石油收入也随之增加,从1962年到1972年石油收入从3.34亿增加到24亿,1973年达到50亿,1975年达到186亿。^[4](P28)

石油在美伊朗特殊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巨大,尽管伊朗获得的好处与美国从中获得的好处不可同日而语。丰富的石油收入支持了巴列维的庞大经济发展计划——白色革命,伊朗经济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经济实现了“腾飞”。同时伊朗利用石油收入购买的武器使伊朗扬威于波斯湾,俨然是波斯湾的霸主。而美国获利更为丰厚。据统计,美国每花一美元购买伊朗的石油,伊朗就得花二美元购买美国的武器等,这样伊朗从石油中得到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国。这使美国从伊朗的石油政治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资收益。而美国从中获得的无形利益则更是无法用美元来衡量。美国凭借其控制的石油财团增加伊朗的石油开采量,源源不断把石油运送到西欧和日本,使它们更加依赖美国,从而阻止了苏联用其自身廉价的石油在西方联盟之间敲开缺口及由此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美国把石油当成冷战武器,控制了西欧和日本。因此,石油成了美伊特殊关系的润滑剂。

四、结论及简要评论

美国基于战略目的考虑,把伊朗的战略位置和石油资源当作遏制苏联扩张的工具;巴列维感激美国帮助伊朗赶走了苏军,帮助他恢复了王位,帮助伊朗结束了英国对本国石油的垄断,帮助其称霸波斯湾,这样两国形成了特殊关系。双方依靠军火贸易为特殊关系提供纽带,依靠石油为特殊关系提供润滑剂。

不过,与美英特殊关系不同,美伊之间的“特殊关系”隐藏着深刻的矛盾。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认识到了一味地无偿提供和出售军事装备给伊朗所存在的潜在问题,一方面超出了伊朗军队对技术的消化能力,伊朗不得不依靠美军的技术人员,这样驻伊朗的美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急剧增加,从1972年到1977年由15,000人增加到30,000人。^[11](P35-36)这些享有外交豁免权的美军引起伊朗民众的憎恨。另一方面,伊朗把大量资金用于购买武器称霸波斯湾,缺少资金用于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迟早会引起国家的动荡,进而影响该地区的稳定,所以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曾以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进展作为给予伊朗军事援助的条件和衡量标准,卡特政府也以人权压迫伊朗进行政治改革。但是,由于美国过分依赖伊朗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和为其提供丰富的石油,同时又希望伊朗用其石油收入购买美国的武器和其他商品,以抵消美国因与苏联搞军备竞赛和遏制苏联而进行的武器研发、越南战争的军事开支,因此美国一再迁就伊朗国王,继续给予伊朗国王支持。美国的这种政策给伊朗国王传递这样的信息:美国是支持国王的政策及其政体的,但实际上掩盖和恶化了伊朗国内的紧张局势。巴列维在许多方面实行的政策与做法(包括“白色革命”在内)几乎是全盘西化,违背了伊斯兰教义,引起了信

仰伊斯兰教民众的强烈不满。同时美国的这种政策给美国人传递了错误信息:伊朗国王是进步的君主,其政体也在逐步现代化,因此在美国人看来,即使巴列维失去王位,伊朗对波斯湾地区的政策和对美国的政策是不可能改变的。在伊朗发生革命、人质事件和现今的美伊恶化的关系事实面前,美国人禁不住哀叹:美国没有利用当时形成的特殊关系,压迫伊朗国王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实行政治自由化,否则美伊关系不会这么糟糕,中东的局势也不会是目前这种样子。^[3](P22)

美伊特殊关系之间不和谐的杂音,就在于美伊之间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也就是双方在人权、自由、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只不过由于互相的利益需要,暂时把意识形态的矛盾弱化、淡化了。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拿破仑的战争中,资产阶级英国会同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国们结成反法联盟。上世纪70年代,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态势,美国抛弃意识形态而同中国改善关系。美国将向全世界传播美国式的民主看成是“天定的命运”,希望伊朗实现民主政治和美国式的文化,一同抵制“邪恶”的苏联共产主义。这不但引起巴列维的反对,更引起了伊朗民众的不安全感,最后导致革命不可避免,美国苦心经营的遏制苏联的篱笆不可避免地坍塌。今天美国还没有走出冷战的思维,一味地强调以民主政治作为友好与敌视美国的界限,这就给其他政体的国家带来不安全感,甚至引起恐惧,这也是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

参考文献:

- [1] David W Lesch.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United States[M]. Westview Press. 1996.
- [2] Edward R. Drachman & Alan Shank. President and Foreign Policy[M]. State University of N. Y. Press. 1997.
- [3] Nayef H. Samhat. Middle Powers and Foreign Policy: Lessons from Irano-U.S. Relation, 1962-77[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 28, No. 1. 2000.
- [4] R. K. Ramazani.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M]. N. Y. 1982.
- [5] J. Bill. The Eagle and Lion[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6] 徐建国. 军火贸易: 国际关系中的特殊战争[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 [7] L. Sorley. Arms Transfers Under Nixon: A Policy Analysis[M].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83.
- [8] 江红. 为石油而战——美国石油霸权的历史透视[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02.
- [9] E. Shaff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ntrol of world Oil[M]. St. Martin's Press. 1983.
- [10] Svante Karlsson. Oil and the World Order: American Oil Policy[M]. Berg Publishers Ltd, 1986.
- [11] C. P Bradley. Rec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Persian Gulf, 1971- 1982[M]. Grantham, NH: Tompson & Rutter. 1982.

(责任编辑: 戴利朝)